



美国外交

〔美〕 乔治·凯南 著



美 国 外 交

(增订本)

〔美〕乔治·凯南 著

蔡阳 南木 李活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George F. Kennan
American Diplomac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84

根据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4年增订本译出

©1984 by George F. Kennan

责任编辑：米小平

封面设计：冯光美

美国外交

(增订本)

乔治·凯南 著

蔡阳 南木 李活 译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华生印刷厂排版

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32开本 印张：5 字数：116,000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12-0155-2/D·16 定价：2.25元

前言，1985年

1950年冬，我应邀去芝加哥大学作一系列讲演，当时我对学术讲演究竟是怎么回事一点也不了解。我设想这是在人数不多的小范围内发表一系列非正式的讲话，并认为这对我是一次机会（事后表明确是一次好机会），可以根据我从事外交工作25年的实际经验，就美国外交方面的某些问题发表几点看法。事实表明，这次讲学比我原来所预料的要艰难得多。这不仅就当场的情况（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而言是如此，就讲学的内容在随后的几十年中继续受到人们的注意这一点来看尤其如此。后面这一点说明现在以增订本的形式重新出版这些讲稿是恰当的。

我要着重提到“以增订本的形式”一语，因为作为本书第三编的最后两篇讲稿，是最近才在格林内尔学院发表的，是特意把它们增补进去的。它们所探讨的问题、至少是探讨到的部分问题，一直为美国舆论所密切关注，但是对这些问题未能、实际上也不可能于1950年加以探讨。其中一些未解决的问题是核武器竞赛引起的，另一些问题是随着朝鲜战争期间及其后出现的冷战而产生的。

在芝加哥的讲学中并没有涉及核武器问题，因为当时我还不断地抱有希望（也许人们会说我这是过于天真），那就是希望我们在进入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境域之前会停下来；而每当我们作出决定把防务寄托在这种性质的武器之上从而促使其他国家也这样做时，我就看到那种可怖的场面在我们的面前朦胧出现。我一直希望看到人们放弃“原子弹”（当时的通称），从而将它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因为原子弹作为一种装备太可怕而且皂白不分，

不能构成一种适用的武器。就美国的核武器政策而言，当时还未收集到有关情况，我不想鼓动人们对这个问题进行推测。我认为最好是帮助人们去寻求在非核环境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的答案。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任务。就当时冷战的政治局势而言，当然朝鲜战争是打起来了，但那是刚发生的事件，结果如何还在未定之天，美国同这场战争有关的政策也还没有拿定。这场战争的教训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也还看不出斯大林身后的时代会有什么变化。

因此，在芝加哥时，我所谈到的是本世纪前半叶的美国外交，也就是在核时代以前或1945年以前的熟悉的环境中的美国外交。我只是在最后一次演讲中才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且那次演讲只论述了战争的起因及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并未言及它的种种后果。

至于构成本书第二编的两篇文章（两文均系为《外交》季刊而写），它们是增补到最初出版的芝加哥讲稿的版本中去的。其中一篇的写作日期要早得多，当时甚至连战后各项问题的大致轮廓还不十分明显；另一篇几乎是和芝加哥讲稿同时写成的，也受到在芝加哥发表的那些讲稿同样的限制。

在格林内尔发表的讲演只打算对上述事实上的限制所造成的缺陷稍许作些弥补，并对那些专门的、从许多方面看来都是新问题的有限的几个方面加以阐述，那些问题从1950年以来一直困扰着美国的决策人。然而那些问题的某些方面——特别是与我们在远东碰到的问题有关的方面——同我在芝加哥谈到的问题有特殊的关系，因此把它们纳入本书看来是适当的。

在最初的讲稿中论述的关于极端合法主义和极端道德主义的问题，在今天大都成为历史问题了。可以肯定，我们仍然有一种回到这两个极端的倾向，如果这样做符合我们的目的的话。但是冷战的混乱状态已产生了一些不可思议的后果，因之近年来我不时感到，我们的法律概念最好是稍多一些道德性，而我们的道德

概念则较多地注意合法性。也许，我们在本世纪前50年的外交活动，以及我们对1950年以后一直困扰着我们的那些大不相同的问题作出的反应，这两者都反映了现实情况，然而这些现实情况比我们在这两段时期作出的具体反应要深刻得多。也就是说，我们缺乏一个有效的、持久的、能够使军事力量和政治方针联系起来的理论，并缺乏一种坚持不懈的意向，在制定我们对其他国家的政策时，只着眼于给自己造成一种可爱的形象，而不是着眼于在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获得实际的和极其需要的结果。也许本书将有助于使举国上下意识到这两方面的不足。

乔治·凯南

前 言

我在美国外交部门担任公职多年之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艰难岁月里开始肩负起制定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责任。政策计划处——这个办公室由我负责筹建，并在它成立后的最初几年里指导它的工作——是国务院第一个这样的正式机构，负责从整体的美国国家利益而不是从局部的利益出发来考虑我们当前的各项问题。在这个公共机关里工作的人员很快就意识到：在据以处理美国对外关系的一些基本概念上，政府内外两方面都缺乏普遍一致的意见。

正是由于认识到缺乏充分说明并被广泛接受的理论基础来支持我们在对外关系方面的行动，这就激发了我的求知欲，要去探讨近几十年来曾经指导过我们的政治家的那些概念。说到底，我们不得不处理的那些重大的新问题，看来大部分都是以往两次世界大战结果的产物。从国际事件运转的规律来看，以本世纪的开端作为起点来检验美国的外交以及美国同这两次世界大战的关系似乎是恰当的。从美国对西班牙战争的结束及第一批“门户开放”照会的发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其间经历了整整15年。就我们所了解的重大国际事件的因果关系来看，这15年是一段大好时期；如果在这段时期中坚定不移地发挥象美国这样一个强大国家的影响，本来可以明显地改变世界事务的进程。就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期而言，情况也完全如此。到1900年时，我们已普遍认识到我国的力量具有世界范围的重大意义，并认识到我们不免要受到在遥远地方发生的事件的影响；从那时起，我们的利益在一些重要方面始终和这类事件卷在一起。

我们的政治家是在什么样的概念激发之下去努力应付这些新问题的？他们在涉及美国外交政策方面的基本目的时提出过什么样的设想？他们认为他们需要设法去实现的是什么？回顾过去的历史，这些概念是适当而且有效的吗？这些概念是否反映出对美国的民主制度与其世界环境之间的关系有更深一些的理解（我们也许早已忘记了这一点，但应当有这种理解，并把它作为我们行动的基础）？或者，这些概念是否从来就是既不适当而又浅薄的？

正是以上这些问题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促使我去研究以往半个世纪中美国外交活动的记录；随着个人的回忆录和论著以及美国学术界研究和分析这类资料获得的优异成果不断出现，这项记录正日益丰富。作为外交史方面的一名新手，我不指望对这项研究工作会有什么贡献，甚至也不能对所有已经问世的关于这些课题的第二手资料作全面的考察。因此，收入本书的讲稿只表明在上述好奇心的强烈驱使下，一个可以称之为门外汉的人试图把已经发表的主要材料的看法应用于手边的一些问题，并指出其不言自明的答案。

就我自己的观点而言，有两种多少是互相矛盾的考虑对这一探讨具有特殊强烈的影响。其中之一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从西班牙—美国战争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时期里，有不少杰出的美国人士殚精竭虑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作出了贡献。他们是一些具有特殊才智和修养的人，由于正直的品格和丰富的经验而深受人们的敬重。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实际上是我们所能提供的最佳人选。就对外关系的基本概念来说，如果连他们的观点也不适当的话，那么美国在理解它自己对世界其余地区的关系方面以及形成这种关系所产生的影响方面之所以有欠缺，其根源应是深藏在民族意识之中的，因之的确很难有所纠正。

同时还存在着另一种考虑，人们面对着这样一个无可避免的事实：即我们的安全，或者说我们所认为的安全，在以往半个世纪的经历中大大地下降了。一个在1900年根本没有想到它的繁荣

和生活方式会受到任何外部世界威胁的国家，到了1950年竟然落到这样一个地步，似乎除了担心这种危险之外就很少顾得上考虑其他的问题了。

我们对这一情况作过什么解释呢？这种情况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应归之于美国外交的失误呢？如果确实有美国外交的失误问题，那么错在哪里——是概念方面的错误还是执行方面的错误？在某种程度上它可能是由于我们的影响范围以外的事态发展所造成的结果，那么这些事态是什么、它们又预示过什么？这些事态是否仍然在发挥作用，它们将把我们带向何方？对这些问题不可能设想在六篇演讲中作出详尽的回答，即使有人认为有现成的答案也难以做到。因之，本书中的几篇讲稿目的在于根据这些问题来探讨个别的事件和局势，希望这种印象主义的方式比直接提出我本人对手头资料的看法更能说明问题。我只在最后一篇中作了一些概括性的论述。我可以肯定，这几篇讲稿的疏漏之处会很容易受到有经验的外交史学家的严正批评。它们所表明结论也肯定会受到广泛的指责。如果它们在这些问题上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促使更明智、更有学识的人去作出更有价值的努力，那它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在芝加哥大学发表的那些演讲所涉及的美国外交活动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其中很少提到美苏关系问题（而这却是我们当今的舆论十分关注的问题）。由于这个原因，很难使一般人都充分认识到美苏关系对当时一些重大问题的影响。因此，我认为把论述美苏关系的两篇文章纳入本书是恰当的，可以认为它们是以同样理智的方法来探讨当前的问题。

我要在此对查尔斯·沃尔格林研究美国社团基金会深表感谢，该基金会赞助了这六次演讲，并感谢《外交》季刊的主编，本书第二编的两文最初是在该刊发表的。

乔治·凯南
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

目 录

前言, 1985年	1
前言	4
第 一 编	
一、美国对西班牙的战争	1
二、希比斯利先生和门户开放	17
三、美国和东方	31
四、第一次世界大战	44
五、第二次世界大战	61
六、现代世界的外交	75
第 二 编	
苏联行为探源	85
美国与俄国的未来	102
第 三 编	
一、回顾沃尔格林讲演	123
二、美国外交与军方	133

第 一 编

一、美国对西班牙的战争

我想首先谈谈关于这六篇讲稿的概念。这一概念决非来自为历史而钻研历史的抽象的爱好。它来自对我们当今面临的外交政策问题所作的专心致志的探讨。

半个世纪以前，美国人民面对他们所处的世界环境具有一种安全感；我认为自罗马帝国时代结束以来还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民有过这样的安全感。时至今日，这一局面已几乎颠倒过来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如今受到一种不安全感的支配，甚至比西欧许多国家的人民的不安全感还要严重，而他们与那些最使我们感到担心的事物的距离更近，他们所处的位置使他们遭受打击的可能性也大得多。看来，这一改变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甚至无疑是主观的，它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在1900年，我们夸大了我们处境的安全，并目空一切地信赖我们的力量和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今天，我们夸大了我们的危险，并倾向于低估我们的实际能力。然而事实还表明：这一改变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在1900年，我们的政治和军事实力的确使我们只感受到了相对来说很少的直接意义上的恐惧；而今天，我坦白承认，在我看来我们面临的形势很危险，而且是极其成问题的。

发生这样的变化原因何在？一个极安全的国家怎么变成了一个极不安全的国家？这样的衰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我们的过错”^①？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没有认识到、或者说没有估

^① 指美国负责外交事务的人员。——译者

计到我们周围世界的实际情况？

换言之，到了1951年，我们就遭到了重重困难以及危险的煎迫和困扰，我们处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它的一部分似乎的确要毁灭我们，而另一部分则对我们自己、对它本身、或者对两者都失去了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一代人从以往50年美国对外关系的记录中能吸取什么教训呢？

就是这些问题在过去几个月中使我回过头来重新检查我们那50年中在国家政策方面所作的一些决定。我确实不敢让诸位抱有希望，认为这次的一系列演讲能回答所有这些问题，或者能无可争议地回答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

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抱有这样的希望：重新研究这段时期中我国政策的某些主要方面，并以回顾的眼光看我们原本可采取哪些代替方法以及它们的后果，这样做是有益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在今天能看到很多人们即使在10年之前也是不可能看到的情况，而且我希望我们能使这样一次探讨具有一种新的严肃性——一种由于我们回想起一生中亲眼目睹的大量破坏和牺牲而产生的严肃性，与两次悲惨的世界战争以前大多数人对待这些问题的态度相比，它是一种更加深思熟虑而且也是更加惨痛的严肃性。

我想首先谈谈西班牙—美国战争。

现在是本世纪前半叶的结尾而不是它的开端，我们有些人认识到了我们感到一直是美国安全所系的某些基本因素。我们可以看出，在我国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的安全一直取决于英国的态度；加拿大则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它对美国和大英帝国之间的良好关系一直起着有益的和不可缺少的保证；而英国的态度如何又取决于是否能在欧洲大陆保持力量的均势。因之对我们和对英国都同样非常重要是：任何一个单独的欧洲大陆国家都不应发展到统治整个欧亚大陆的程度。说得确切一些，我们的利益在于保持大陆国家之间相当稳定的平衡，使得它们之中的任何一个

国家都不至于去征服其他国家，不至于攻占有利于航海业的大陆边缘地区，成为既是陆上又是海上的强国，不至于损害英国的地位，也不至于——然而在上述情况下却肯定会——从事敌视我们的海外扩张并取得欧洲和亚洲内地广大资源的支持。鉴于这些情况，我们可以理解到，那些欧洲和亚洲外围国家的繁荣和独立同我们利害相关，这些国家的眼光向外注视着海外，而不是向内注视着陆上军事力量的征服。

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些道理，或者自认为认识到了这些道理。但是1898年的美国人却很少能认识到这些道理，因为那些美国人已忘记了100年前他们的祖先所熟悉的许多事情。他们已变得非常习惯于他们所享有的安全，因而全然忘记了这种安全在我们大陆之外的那些基础。他们错误地认为我们处于受英国舰队和英国对欧洲大陆外交策略庇护的地位，是因为美国具有卓越的智慧和道德，能克制自己不去干预旧世界^①的可耻争吵。他们也很容易地就忘记了这些变化的最初预兆，而这些变化在随后半个世纪中注定要摧毁那种安全局面。

当然也有一些人是例外。亨利的兄弟布鲁克斯·亚当斯^②可能比他同时代的任何美国人都更接近于理智地预感到我们的将来究竟怎么样。^③但即使是他也只领悟到其中的一部分。他看到了英国的脆弱性日益增加——也就是他所说的英国经济地位的“偏心率”日益增加——以及英国在经济上的发展要依靠美国，而反过来美国在战略上则日益依靠英国。他意识到海军力量和陆军力量之间的区别的极端重要性。他模糊地感到俄国和德国及中国之间的合作的危险性。但是他的见解由于受到当时唯物主义的影响

① 旧世界泛指欧洲。——译者

② 布鲁克斯·亚当斯(Brooks Adams, 1838—1918),美国历史学家及作家。

——译者

③ 参阅布鲁克斯·亚当斯著《美国的经济优势》中的“西班牙战争与世界均势”一文，该书新版附有马奎斯·蔡尔兹的评价(1947年，纽约)。

而失之偏颇：他过高地估计了经济和贸易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作用，又过低估计了对推动人类活动起主要作用的心理反应和政治反应——诸如恐惧、野心、不安全感、猜忌，也许甚至还有厌恶情绪。

马汉^①在当时也在为分析国际客观形势规划新的途径——这些途径把人们引导到对美国安全问题的根源作较深刻的估价的方向。在这方面可以提到的还有其他一些人。但总共加在一起他们的人数也非常有限。他们的努力不论在当时还是在紧随其后的若干年里都后继无人。那些努力——在美国人对外交事务的思考普遍处于自得其乐的冬眠状态下孤零零地突然迸发出来的理性活动——好象是始终悬在历史的半空之中。而所有那些人——所有那些在本世纪之初思想较深邃而观察力较敏锐的人——在未完成他们探究欧洲大陆这个各方竞争的舞台的计划之前就停了下来，而关系到美国安全的极其重大的事件恰巧注定要在那里发生，我们也极其需要对那里的情况作深入的分析，仔细辨认构成美国利益的种种要素。

由于这个原因，很明显，我今天要谈的这一事件——我们在1898年对西班牙的短暂战争——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发生的：即我国公众和政府在思想上没有非常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的安全所系的全球体系。情况虽然如此，但幸运的是，导致这场战争的形势以及战争本身的绝大部分活动和后果就其重要性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是局部的和国内性质的。随着我以后的几次演讲并进而谈到20世纪的情况时，我们将会了解到我们的判断和行动具有的世界意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迅速扩大，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这种意义就确实不容忽视了。但是在西班牙战争时期，它们却几乎不存在——我们采取的最接近于这种意义的行动是占领菲律宾。

^① 马汉 (A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美国海军军官及海军史学家。——译者

如果说从我们同全世界的关系这一观点来看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那么它之所以值得我们今天用整个下午来加以探讨，是因为它作为我们考察这半个世纪中的外交的开端，既简单又奇妙地阐明了我国对某些事务的反应和处理方法，并揭示出如果我们想要成为一个有能力肩负起领导世界责任的强国就注定要经历的那段路程。

你们一定还记得我们对西班牙的战争起因于古巴的形势，那是一种似乎表明殖民地关系已经没落或衰竭的可怕的、悲惨的、毫无希望的形势。我们在其后也看到过其他这样的形势，其中有一些是在不久以前出现的。西班牙对古巴岛的统治遭到古巴叛乱分子的反对，叛乱分子的组织 and 训练虽然很差，但他们按照典型的游击队原则四出作战，并享有游击队在本土作战的种种有利条件来对付不受欢迎的外国敌人。西班牙镇压叛乱的行动既缺乏效力又残酷，只取得部分的成功。这一形势已酝酿了很久；它是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点一点地扩展起来的。早在20多年前，格兰特总统^①在1875年的一篇国情咨文中就很好地概括了这一形势：

双方似乎都完全有能力给另一方，以及对有赖于该岛和平的各有关方面和各种利益集团造成巨大的破坏和损失；但是他们似乎不能达成任何协议，迄今双方都远远未取得任何成就使一方能占据并控制该岛以驱除另一方。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结束这场斗争，看来由其他方面的机构进行调停或干预是迟早必须采用的唯一方法。^②

确实，在1875年至1895年之间的20年中，形势有所缓和。但

^① 格兰特 (Ulysses Simpson Grant, 1822—1885)，美国第18任总统 (1869—1877)。——译者

^② 1875年12月7日的“国情咨文”。

是在1895年叛乱再度爆发，这次流血的规模和凄惨的程度都超过以往。到了1896年和1897年，这种情况使得美国政府、新闻界和公众越来越感到担心和沮丧。

当然，严格说来，我们本来可以说这与我们根本无关，可以听任事态自然发展。至于我们国家的安全，正如我们现在所认为的，在当时并未受到威胁。但是美国的资产利益却受到了损害；美国那些代表叛乱分子利益的国会议员（他们用长篇发言阻碍会议进程）和军火商的活动给我们的政府制造了大量麻烦。而最重要的是，关于该岛发生种种暴行和悲惨事件的传说使美国舆论界深感震惊。那时我们的感官还未被20世纪的大量恐怖事件和残酷行为刺激得麻木不仁。古巴人民遭受的痛苦震撼着我们的感官，激起了我们的义愤。古巴人民遭受的痛苦使美国政治家们深信：古巴的这种形势继续下去对我们的利益来说终究是不能容忍的，如果西班牙不能予以制止，我们将不得不以我们自己的某种方式进行干预。

1897年秋，情况似有好转。一个比较温和的新政府在西班牙上台。这个政府表现出比它的前任有更明显的意向要解决该岛的那些不幸的问题。1897年12月，麦金利总统^①在致国会的咨文中指出了这一进步，并建议我们给予西班牙新政府一个机会。他说：“我不怀疑它的诚意，也不会在它着手这项工作的时候表现出不耐烦而使它感到为难。”他说：某些困难问题已经解决；有理由希望，只要我们方面保持耐心，西班牙政府方面继续表示友好，就有可能取得进一步的进展。因此，1898年到来时重新出现了这样的希望：古巴人民的悲惨命运会有好转而不是恶化。

不幸的是，那年冬季发生了两件事使局势急转直下。首先是，西班牙驻华盛顿公使写了一封非常轻率的信，他在信中轻蔑地谈到麦金利总统，称他是“一个哗众取宠的人”，“一个冒牌

^① 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 1843—1901），美国第25任总统（1897—1901）。——译者

政治家……他试图给自己留下退路同时又和党内的侵略主义者保持良好关系。”^① 这封信被透露出来，发表在纽约的报纸上，引起人们极大的愤怒和憎恨。几天之后，“缅因”号军舰在哈瓦那港被炸沉，266名美国人丧生，消息传来使美国公众异常震惊和愤怒。

现在回顾起来，这两次事件本身似乎都不足以引起战争。西班牙政府对其公使的轻率是无能为力的——甚至不少外交家都经常有轻率之处，这种事情在最优秀的阁员中间也往往发生。西班牙政府立即免除了这位公使的职务，并否认了他的攻击性说法。至于“缅因”号，则始终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西班牙政府与该舰的沉没有关，或者说，所表明的只不过是该政府对认为它可能与这一事件有关感到异常惊骇。西班牙当局，还有我们自己的驻哈瓦那总领事，都曾要求我们不要派遣该舰在那种时候到那里去，原因就是他们担心这样做可能出事。西班牙政府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尽了一切努力来减轻这场灾难的影响，欢迎进行调查，并在最后建议将事件的全部责任问题诉之于国际仲裁——对这一建议我们始终未予接受。

尽管如此，但看来历史作出的判决是：这两次事件对美国舆论影响很深，致使战争由于“缅因”号的沉没而不可避免。从那时起，美国政府实际上就未对任何和平解决方案给予认真考虑。这一点极其重要而且十分不幸，因为在“缅因”号的沉没和爆发敌对行动之间的9个星期中，西班牙政府在满足我们的要求和愿望方面作了很大的让步。西班牙政府的大幅度让步，使我们驻马德里的公使——一个为防止战争爆发作过艰苦努力的聪明而有节制的人——得以在4月10日（敌对行动开始前11天）向政府报告：如果国会授权总统自行处理这个问题，那么总统就能在8月1日以前根据下述几项基本原则中的一项最后解决问题；这些基

^① 查尔斯·奥尔科特在《威廉·麦金利传》第二编第九章中所引的杜拜·德·罗姆的信件（波士顿和纽约，1916年）。